

受降堂遐思

□李笙清

在地处武汉市汉口繁华地带的中山公园内，有一座白墙黑瓦的简陋平房，静静地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下，与园内其他建筑风格迥异。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带着一颗瞻仰与缅怀的心，我来到中山公园，再一次走近这座承载着华中地区抗战伟大胜利的受降堂，内心经受了一次神圣的洗礼。

中山公园始建于1910年，原名西园，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公园初为私家花园，1927年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为中山公园。位于中山公园西北角的受降堂，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定的中国战区16个受降点之一，2002年11月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普普通通的平房建筑，见证武汉这座英雄之城、胜利之城的历史荣光。

跨过高高的石拱虹桥，拐过两层小洋楼建筑的国史陈列馆，当我伫立于胜利广场，受降堂那白色的墙壁便映入眼帘。这座长方形厅顶厅堂式横列建筑始建于武汉沦陷时期，坐西朝东，砖木结构，马尾屋架，白墙青瓦，长34米，宽12米，占地355平方米。1942年，在日军汉口特务部的操纵下，当时的大汉奸张仁蠡为粉饰太平，重塑形象，特意在此地主持兴建张公祠，以祭祀他的父亲——曾在武汉留下卓著政声的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没想到3年之后，这座供奉着张之洞牌位和张氏家谱的普通建筑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第六战区接受华中日军代表举行投降仪式的受降堂，历史给了日伪一个极大的讽刺。

1945年9月18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34天，乘程赶到武汉的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特意选择了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开端的“九一八事变”14周年纪念日，在这座建筑内举行了载入史册的受降仪式。当天下午3时，孙蔚如在副司令长官郭忏、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玖及美军军官等陪同下，接受了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战犯冈部直三郎等投降代表的投降。受降仪式长达两个小时，曾经骄横残暴的侵略者一个个被摘除军刀，垂头丧气地签署了受降书，曾经的不可一世已是荡然无存。此次受降，共接受日军官兵202335人，骡马9967匹，手枪4474支，步枪159654支，轻机枪4585挺，重机枪566挺，以及大量火炮、子弹。一个星期内，武汉地区日军5万余人全部被解除武装。

现在的受降堂是2000年修复完成的建筑，室内室外均按“尊重历史、整旧如旧”的原则恢复原样。堂内辟有“受降堂陈列”展览，免费对外开放。从此，这里成为武汉市举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来中山公园的游客无不来此一游，缅怀华中抗战的英勇顽强和抗战胜利的辉煌历史。

受降堂正面开有3个门，当我沿着宽阔平整的林荫道走近朱红斑驳的受降堂正门时，只见悬于门楣上的木质横匾上，3个方格内的红底黑字“受降堂”格外醒目，仿佛在警示每一个瞻仰者，永远牢记抗战胜利这段令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正门一侧的墙壁上，镶嵌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湖北省人民政府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七日公布，武汉市人民政府立”的牌匾，另一侧分别挂着“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武汉市国防教育基地”的牌匾。这时，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受降堂前，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一名年轻的女教师指着受降堂的牌匾，讲解着武汉受降的这段历史往事。

随着参观的人流走进受降堂大门，一面展墙映入眼帘，受降堂陈列的前言简明扼要，介绍了堂内展示的主要内容。两页牌匾分列两边，一边是毛泽东同志1945年9月为重庆《新华日报》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另一边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8周年之际，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时的讲话精神：“牢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历史，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底白字十分醒目，令人精神振奋。

受降堂陈列规模不大但内容丰富，周边展墙上以抗日烽火、江汉怒潮、血染楚天和受降纪实四个单元展开，射灯照射在这些由300余幅图片和说

明文字组成的展板上，它们分别介绍了日寇侵略、抗战兴起、武汉会战及日军对武汉的血腥统治、日本投降后的武汉受降等内容。在展览中还穿插布置了陈列展柜，展出实物及复制品近50件，既有1938年驻扎在中山公园的日军拆毁园内龙桥的龙身残片，也有侵华日军使用过的望远镜、钢盔、水壶、饭盒、迫击炮弹、子弹盒、军大衣、风衣、膏药旗、防毒面具、创口消毒液等原件，还有八路军使用过的汉阳造刺刀，以及坚持在武汉周边抗战的新四军战士使用过的子弹袋、收缴的日军指挥刀等实物，这些抗战遗物将我的思绪带到那艰苦卓绝、战火纷飞的年代，新四军第五师在长江沿线、中原地区抗击了20余万日伪军，坚持抗战数年之久，对日伪军作战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尤其是三打休儒山战役，给了日伪军沉重打击。这些弥足珍贵的抗战遗物，就像是一件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让人抚今思昔，对千千万万为抗战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军人充满敬仰，也让人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受降堂正中靠后墙位置，特意对当年受降签字仪式的会场按老照片等历史资料进行了场景复原。墙面正中悬挂孙中山遗像及二战盟国英、美、中、苏四国旗帜。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上，摆放着中日双方出席受降仪式代表的铭牌，八把椅子排放整齐，整个会场简陋而又显得庄严肃穆。

看着眼前的场景，我的视线渐渐模糊，耳边依稀响起《保卫大武汉》的激昂旋律：“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进在长江，全国发出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组令人热血沸腾的生动镜头：一身戎装的受降主官孙蔚如立于桌前，对面垂手而立的冈部直三郎等日军投降代表高声宣读“大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声若洪钟，振聋发聩，余音绕梁，久久不息；垂头丧气的冈部直三郎用颤抖的双手在受降书上签字，然后毕恭毕敬地递给高大威严、一身正气的中国将军……

受降堂内，有一个紧贴于地面的玻璃展柜，一块斑驳的长条形石碑静静地平放在蓝绒布上。这是当年的汉口市政府为铭记受降仪式而修建的一座受降纪念碑，碑上所有文字均为孙蔚如将军亲笔题写。石碑为汉白玉材质，长122厘米，宽40.3厘米，厚5.6厘米，正面镌刻“受降堂”三字，背面草书碑文：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题。这块石碑当年竖立于受降堂门前10余米处，大约立于1946年5、6月间，后来不知去向。1998年6月中山公园筹备70周年园庆，在清理文物史料时，石碑被发现于园内张公亭底层，这件记录着受降见证的珍贵遗物在尘封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当时，中央电视台和许多地方电台、报纸对受降纪念碑的发现进行了报道，武汉部分著名历史专家学者还专门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一致认为：受降纪念碑和受降堂是全民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是向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依据，是武汉地区的重要历史建筑，因此，修复受降堂和受降纪念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铭记历史，警示后人，园方特意在受降堂右侧辟出一块正方形空地，在花岗岩围栏内，修建了一座高180厘米、宽60厘米的花岗岩汉白玉碑面的纪念性石碑，砌筑在黑色大理石的基础上。碑身正面竖排镌刻“受降纪念碑”五个大字，背面镌刻的是孙蔚如亲笔题写的受降堂碑文，所有碑文与受降堂展柜里的石碑上文字书体保持一致，龙飞凤舞，苍劲有力。

微风拂面，翠竹青青，松柏伸出的枝叶轻拂着碑身，仿佛在抚慰那些在浴血抗战中逝去的民族英雄，又似在警示碑前的凭吊者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与和平。灿烂的阳光下，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面对纪念碑，久久不愿离去。听推着他的孙子说起，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年近百岁的抗战老兵，经常来受降堂转悠一下，寻访当年的记忆。从老人凝视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中国军人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离开受降堂时，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朱日和建军90周年的阅兵画面，令人振奋。

路痴也有小美好

□胡美云

朋友圈看到有友发动态：在某个地下车库绕了快半个小时还没找到出口，心态已崩，有个朋友反为这事。边上配了一个破涕为笑的表情，有种回味无穷的喜悦感。屏幕那头，作为一名资深路痴的我，瞬间理解了她的某种心情。

我自小就是个方向感极差的人，又容易走神，出门找不到方向，或者在走过许多次的地方迷路，已是常态。要赶时间时碰到迷路真正令人抓狂，但没什么事闲逛时的迷路也有妙处，能收获一些别样的小美好。

记得有次带着两个女儿到厦门思明电影院看电影，其实是走了无数次熟悉的路了，但从开不路往八市闲逛时，左拐右拐忽然迷了路线，开始很不自信地拐进一段路就问一下人，然后才敢接着往下走，走到后来，最后一次站在路边问指挥交通的警察路线时，到现在我都还忘不了他当时朝着马路对面，指着醒目的“思明电影院”几个大字，一脸压不住的笑意。那笑意伴随着我们母女三人的道谢和不好意思，一直目送到我们到电影院的大门。虽然因为迷路而多问了许多陌生人，也闹了很多笑话，但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间，成了一份美好而温暖的记忆。

有一次，我打算去图书馆借几本书。到图书馆对于我来说自然是轻车熟路的事，可那天我竟鬼使神差地拐进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小巷。起初，我还没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只觉得小巷宁静又美好，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住了。铺着石板条的小巷是那么古朴安宁，岁月刻下的印痕在上面清晰可见。小巷两侧是一些古旧的房子，一些老人坐在门前闲闲地聊着天，偶尔有孩童嬉戏。走着走着，竟然听到了一阵悠扬的二胡声，循声望去，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门口专注地拉着二胡，脸上洋溢着沉醉的

神情，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 he 无关。于是，我很自然地停下了脚步，静静地站在那里听了许久，时间仿佛静止了，而我也忘却了原本的目的地，沉浸在这偶然得来的美好之中。

关于迷路的最早记忆，是在童年时和小伙伴们到家附近的桃花山上摘映山红，山脚下的映山红总是稀稀疏疏的，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几个的采摘欲望，于是我们开始循着花的踪迹，往更多的地方寻找，不知不觉，山爬得越来越高，树林越走越深，自然也如愿找到了期待中一丛丛茂盛的映山红，那种寻到桃花源般的开心与兴奋现在想想依然清晰如在眼前，我们尽情地挑着自己喜欢的花采摘着，直到每人手上都捧了一大束的映山红，才心满意足地准备下山回家。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山高树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回家的方向了，直直往下走，不知道到达的会是哪个村哪个队。一阵心慌之后，不知道谁喊了一句：要不我们干脆爬到山顶吧，这样往山下一看，就知道我们队在哪里了，然后直下山就是了。

在小伙伴的提议下，我们手捧鲜花，一路奋发向山顶而行。到了山顶以后，我们第一次以那么高、那么辽阔的视线看到自己生活的小村子，看到熟悉的田野河沟，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陌生而亲切。在山顶上，我们又停了许多，收获了一堆叽叽喳喳的快乐，然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村子的方向一路向山下走去，顺利归家。虽然因为迷路耽搁了回家的时间，还被大人责骂教育了，但那意外的收获，以及所带来的认知与快乐，成就了一次难忘而美好的经历。

在我们按部就班平淡前行的生活中，偶尔偏离轨道迷路的时候，那些在慌张与迷茫中发现的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美好，以及所遇见的意想不到的风景和温暖，它们有时比既定目的地的风景更为动人，同时也多了许多趣味，让记忆多了一些别样的色彩。

江花周刊

伊犁三记

□蔡家园

紫色精灵

一直难忘观看杰克逊·波洛克的《薰衣草之雾》时所受到的震撼。这幅长达三米、高两米多的油画气势恢宏，给人强烈的压迫感。画面中星罗棋布着各种或粗或细的线条，有的弯曲，有的笔直，那些淡紫、银色、白色、土黄、淡绿的颜色也是相互缠绕、扭结，看似杂乱无章，却又暧昧和谐。这幅画采用的是上帝视角，凌乱的野草纵横交错、没有边界，直接铺陈在观众的视野中。更奇特的是，它没有透视空间，前景和背景相互渗透，呈现出一种朦胧、跳跃的不确定感。波洛克描绘的是收获过后的薰衣草草地吗？画面上并没有雾的感觉啊？这位抽象表现主义大师对美的表现确实太抽象了，让人如坠迷雾，这大约也应了画作的题目吧。仔细分辨，画中就没有一株完整的薰衣草，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表现薰衣草的最著名的绘画之一。

那年夏天我去欧洲旅行，特地去普罗旺斯的一个小村看薰衣草。站在明亮的太阳下，说实话，一望无际的紫色花田并没有让我产生惊悚之感。平常在电视里看过太多的薰衣草画面，那种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美感在强烈的日光照射下荡然无存。我在花田里逡巡，那流淌的深紫色让人感到异常沉闷。我想起凡·高在当地生活多年，他为什么没有专门画过薰衣草呢？只是在《星月夜》中，薰衣草和向日葵一起作为视觉元素进入了画面。凡·高将金黄与紫色融入如漩涡般旋转的星空中，营造出一种混合着热烈与忧郁、浪漫与神秘的意境。凡·高是不是也从那无边无际的单一色调

果子沟

地球上的万千事物最早都没有名字，直到与人类发生关联，那些山川河流草木才最终获得命名。天山腹地的那些沟壑也是如此，最早也都是无名的。就像碧野在《天山景物记》中所写的：“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红花果熟，正是鸟雀野兔的乐园。这种野果子沟往往不为人们所发现。”在天山磅礴的怀抱里，像这样的野果子沟何止千百条，但是，其中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条被命名为“果子沟”，成为后来的游客们流连忘返的打卡点。碧野是这么说的，“其中有这么一条野果子沟，沟里长满野苹果，连绵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长沟里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泥。”

这才有名字的果子沟，想来就让人感到格外亲切。当汽车穿行在盘山路上时，漫山遍野的野苹果树连绵不断地闯入眼帘，让人不禁恣意想象那新花绽放的壮阔景象，到了深秋时节，成熟的苹果纷纷落地，发酵后产生的芳香，隔空都让人感到熏然……当我第三次穿越果子沟时，终于有机会驻足欣赏沟中的初夏盛景。古人形容果子沟“山水之奇媲桂林，崖石之怪胜雁岩”，未免有点夸张过头。这里山峻沟深，甚是雄奇，林木葱茏，自然清新，更有各色花果粲然，堪称灵魂慰藉，何必硬要去与桂林、雁荡之美比高低呢？想起林则徐在日记中所记，“天然画景”“步步引人入胜”，确是言之不虚。

站在松树头观景台上——这里不是一颗松树，为什么叫“松树头”呢——向北可以远眺赛里木湖。这是一个被命名为“祝福”的湖，那一湖蓝色随着天光变幻无穷，在白云的映衬下最是勾魂摄魄。转身向南，正好俯瞰果子沟全貌。满目苍翠顺着山坡滑下，向着沟底奔涌而去，各色小花在草丛中躲躲闪闪，只有风呼啦啦叫着它们的名字。远处的一条钢铁巨龙呈S形穿越山谷，气势磅礴地向崇山峻岭间冲去，那里呼喊出的是现代科技赋予的名字——果子沟大桥。

在山坡上漫步，一束束、一丛丛的野花不时从草丛中跳跃而出，叽叽喳喳往人眼帘里扑。有些野花看上去眼熟，就如自家的孩子叫得出名字，譬如那紫色的叫新疆芍药，白色的是细叶白头翁，蓝色的叫勿忘我，雪白的是银莲花，黄色的叫毛茛。更多的野花则是陌生人家的孩子，一个个扬着可爱的俏脸，可真是不知其名了。我准备打开手机上的“形色”软件进行扫描，这样也许能找到它们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同行的一位诗人说，不要用软件了，干脆由我们来给它们命名吧。那些不知名的野花中，有一种红色的小花尤其引人注目。它们长得密密匝匝，铺在绿草丛中显得异常明媚。那么，首先给它们取个名字吧：微风轻漾，枝干纤细的小红花颤抖着像在跳集体舞，就叫它会跳舞的小姑娘如何？那种淡绿色的小花，就叫绿衣仙子吧！那种深黄的小花呢？叫染秋。还有那种淡紫色的呢？叫紫鹃——这不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吗？

我们一路走一路笑，一路给各种小花取名字。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这些野花可能都已有了名字。可是今天，一群作家、诗人来了，要重新给它们命名。这样的命名固然随心所欲，可是带着生命想象，带着情感和温度。它们是对沉默的唤醒，也是对庸常的擦亮。那一声声热烈的呼唤，唤起的难道不是饱含诗意的神圣新生么？正如果子沟、赛里木……

我多么希望留在果子沟中，住岁月的更深处潜行。我要给那些一代又一代不为人所知的苹果树，还有山杏、核桃、毛柳、山楂树、野巴旦重新命名。当那些被忽略的平凡事物获得语言照亮时，它们有福了，我们也有福了。

石狮

的石狮呢？

当地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当年沙俄侵犯新疆强占惠远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伊犁的石匠们出于义愤，故意将石狮设计成羊头、狗耳、鱼眼、鹿尾和俄罗斯人的大鼻子，以讥讽来犯之敌。这传说有一定的合理性，表达了伊犁人民深沉的爱国情怀。毕竟经过了一百多年，这对石狮的具体来历已经不可考。站在石狮面前，我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伊犁地处边地，信息闭塞，当时的石匠们多半没有见过真狮子，只能凭当时的传说和自己的想象来造型。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石狮文化的束缚，这个“百兽之王”虽然身驱庞大，凶猛凶狠，可本性就是顽皮可爱，不过一个超大的玩物而已。于是他们尽情发挥想象，如磋如磨，这对“六不像”就这么诞生了——也就成了一种与主流审美相异的边地美学。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想象：如果这对石狮正是摆放在伊犁将军府门前的，那说明这奇特的造型也得到了伊犁将军后的认可。当年，大将军围着石狮观看，是不是一边捻着胡须一边呵呵直乐呢？

无论如何，一种融合了端庄、威严与夸张、滑稽的美，就这雕塑在伊犁的土地上，供后人凭吊和遐想。如今，当我们抚去时光的暗影，走近两只石狮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身上曾染过黄色油漆——那是富贵的颜色。经历了风霜雪雨的侵蚀，那些涂料已然剥落，狮身裸露出本来的灰色质地，更显粗犷和沧桑……突然起风了，庭院里的杨柳哗啦啦作响，将军府显得更加静谧。那风似乎从遥远的历史中吹来，吹落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石狮身上，越发烘托出一股子俏皮与可爱。忍不住伸手去抚摸那温热的身躯，似乎能感受到深藏于石头里的一颗不羁之心，怦怦地仿佛要迸跳出来……



母爱·藤席

□郑因

又到了一年一度避暑消夏的光景。点开手机，带货卖凉席、藤席的小视频铺天盖地。让我不由得想起那年母亲给我送藤席的场景。

那是1988年夏天，父亲出差重庆万县，带回来两床藤条编织的可以折叠的凉席，母亲说，我给荣荣送一床去吧。父亲说，本来就是给荣荣买了一床，但这么热的天，你的腿也不方便（母亲因为照料住院的外婆，在医院滑溜溜的水磨石地板上摔了一跤，导致左腿膝关节骨折，钉了钢钉，创面缝合了14针），去荣荣那里要转两趟公交车，你就不要去了，等哪天洪洪（我大弟）休息，要他送去吧。母亲说没事，带上淼淼（我侄女），早点出门，热不着。

那时我刚刚在红钢城有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父母亲都还没有来过，当然想过来看看，他们的女儿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父亲也就没有再劝说母亲。母亲背了藤席，拄了拐杖，带上5岁的淼淼，早上7时从武昌粮道街出发，中午11时30分才找到我在红钢城23街的门楼。我家到我供职的《武钢文艺》编辑部，交通十分不便，只有一路厂区电车，坐两站，两头都要步行十几分钟。于是，中午我就不回家，在单位吃快餐，在办公室休息。

母亲不知道这事，她和我侄女就坐在我楼下门前的树荫下等。那一排银杏树，树高不及2米，树冠直径不足1米，那阴凉本来就少得可怜，到正午，就彻底地没有了。

我住5楼，住4楼的张师傅下班回家，活泼的淼淼即刻上前，小嘴叭叭道：伯伯你家好！我姑姑在《武钢文艺》当编辑，《武钢文艺》么样走呀，我们要去找我姑姑，不晓得往哪里走。

张师傅年轻时是一个“文青”，他的女儿也喜欢读报纸杂志什么的，我经常送一些给他家，有时我在楼下给自行车打气，他只要看见了，总是热心地帮我打气，两家的关系处得不错。张师傅听了我侄女的话，就热情地邀请我母亲她们到他家里休息，并从冰箱里取出武钢特有的咸汽水给她们解暑，然后说，你们就在我家歇一会儿，我去《武钢文艺》编辑部喊郑老师回来。

张师傅骑车顶着正午的毒日头找到《武钢文艺》编辑部，背心都汗湿透了，见到我就急切道：郑老师，快回家，你母亲还有侄女来了，在我家等呢……

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师傅真是个好入，你去买个西瓜给他送去吧。我当时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没接母亲的话，关上门就埋怨：这么热的天，您家的腿又不方便，到处跑个什么？中暑了怎么办！

母亲也不接我的话，固执地说，你去买个西瓜送张师傅吧！

我一下子发了犟性，连说不买不买就不买。心想，两家关系本来就不错，邻里间相互照应没什么，买个西瓜送去反而见外了。但我没向母亲解释这些。想不到，母亲掏出10元钱放在桌上，态度决绝地说，我腿不方便，拿不动西瓜，你替我买一个送给张师傅！说罢就拄着拐杖走了。

我当时真是蠢到家了，竟然没有拦下母亲。母亲走了10多分钟，我才跑出去追赶。小巷里车来人往，又哪里觅得到母亲的踪影！

下午把侄女锁家里看电视，我去上班并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说母亲没有回家。快下班时，我家以前的老邻居、母亲的老姐妹来了电话，说母亲在她那里。电话那头母亲哭得一塌糊涂，说我读书读到哪里去了，书上讲的“八百买房，千金买邻”的道理懂不懂？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还搞什么写作，当什么作家？

电话那头是母亲伤心至极的抽泣，电话头是我悔恨不已的泪水。

最终我也没有听母亲的话，买个西瓜送给张师傅，也没有对母亲说一声对不起。只是每年夏天，吃西瓜用凉席的时候，心怀内疚和惭愧，咀嚼并体验母亲的温暖、善良、认真，还有脆弱。

转眼，母亲走了14年了。而母亲给我送的凉席可以折叠的藤席，一直陪伴着我，上面用了10多个补丁。有几次我把它叠起来，抱出去想扔掉它，但走到垃圾箱旁又把它抱了回来。说实在话，就藤席本身而言，它已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但它饱含父母的深情，使我欲罢不能。